

“兩黨政治” “以黨治國” “全民政治”：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探索

朱漢國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孫中山在探索中國政治模式的過程中，曾提出或嘗試了多種政治模式。民國初年，他效法英美，嘗試兩黨政治模式；嘗試失敗後，他提出“以黨治國”模式，並仿效蘇俄，積極付諸實踐。事實上，在孫中山設計的理想模式中，既不是英美的兩黨政治，也不是蘇俄的“一黨治國”，而是“權能分開”的全民政治。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每一個設想，都是為了在中國建立近代民主政治體系。作為中國民主政治的探索者，他對中國政治體制所設想的每一個模式，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都為後人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對他身後中國政治體制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廣義上的政治模式，泛指政治體制。一定的政治模式，反映了一定的政治行為者和政權的關係。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在創建中華民國，促進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過程中，曾對中國的政治模式進行了一定的理論探討和實踐活動。考察孫中山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探索過程，將有助於我們對孫中山政治思想的深入研究，也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現代政治體制的進一步認識。

一、孫中山與民初兩黨政治的嘗試

孫中山對中國政治模式的探索和嘗試開始於民國初年，是從他主張效法西方國家，嘗試兩黨政治開始的。

兩黨政治，是近代西方國家盛行的一種政治模式，其含義是指勢均力敵的兩大政黨，通過控制議會多數席位和贏得選舉的勝利，來實行輪流執政。試圖仿效西方國家這種兩黨政治模式，在中國確立近代意義的政治體制，是民初資產階級黨人的共同理想，也是孫中山對中國政治模式實踐的第一次嘗試。

從輿論宣傳上講，可以說孫中山是民初資產階級黨人中闡述兩黨政治理論最為詳盡的一位。在 1912—1913 年近一年的時間里，孫中山就兩黨政治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演說和文章，對兩黨政治的理論進行了詳盡的論述。

（一）孫中山闡明了兩黨政治的優越性

孙中山认为，两党政治的最大长处，就在于能“互相更迭、互相监督”。¹他说：“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²1913年他在为《国民月刊》所写的创刊词中，把两党政治的优越性则说得更为明了：两党执政“轮流互易，国家之进步无穷，国民之幸福亦无穷焉”。³

（二）孙中山从理论上规划了中国两党政治的基本设想

孙中山认为，中国的政党政治，应当仿效英美，具体设想是：（1）建立进步与保守两党。他说：“国中政党，只当有进步、保守两派。”⁴（2）甲乙两党轮流执政。他说：“甲党执政，则甲党以所持之政策，尽力施行之。而乙党在野，则立于监督者之地位焉，有不善者则纠正之，其善者则更研究至善之政策，以图进步焉。数年之后，甲党之政策既已实行，其善不善之效果亦已大著。而乙党所研究讨论之进步政策，能得大多数国民之赞同也，于是乙党执政，以施行其政策，而甲党则退立于监督之地位。”⁵

（三）孙中山阐述了实行两党政治的条件和方法

孙中山认为，实行两党政治是有条件的：（1）必须有健全的政党。他说：“欲求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⁶，为此，他提出了必须以主义建党的主张。（2）必须形成两大政党对峙体系。他认为民初政党林立的局面不利于实行政党政治。他说：“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⁷为此，他提出了组建大党的主张。（3）必须学会党争。他认为两党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⁸。为此，他要求党人必须学会党争，提出“党争必有正当之方法，尤必具高尚之理由。”⁹争斗的双方“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¹⁰

孙中山上述关于两党制的论述，其要点就是呼吁国人以英美为模式，在中国确立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孙中山的理论，实际上也是西方政党政治理论在中国的翻版，在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一种脱离实际且富有学理的理想罢了。难得的是，孙中山与他的伙伴一起，竟在这种理想指导下，对两党政治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如果稍稍整理一下孙中山在民初的政治活动，我们就不难看出，他的主要活动，都与两党政治有关。我们不妨选几例来说明。

其一，按英美两党政治常例，两党政治离不开国会和议院。为此，1912年1月，中

¹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2011年5月第3版，第5页。本文所引《孙中山全集》均为中华书局2011年版，下略。

² 孙中山：《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35页。

³ 孙中山：《〈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64页。

⁴ 孙中山：《在烟台社会党、同盟会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3页。

⁵ 孙中山：《〈国民月刊〉出世辞》，《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63—64页。

⁶ 孙中山：《在北京共和党本部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40页。

⁷ 孙中山：《中华民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93页。

⁸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5页。

⁹ 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5页。

¹⁰ 孙中山：《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08页。

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即提出了國會組織法大綱，決定仿行英美國家的兩院制。孫中山於下野之前，突擊性地頒發了帶有根本大法性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搭建了三權分立的政治框架。

其二，按英美兩黨政治，必須擁有兩個對峙的大黨。為此，當 1912 年 5 月梁啟超等人在上海率先糾合幾個小黨組建共和黨後，孫中山與宋教仁等一起籌建大黨，並於 1912 年 8 月 25 日，聯合統一共和黨等小黨團，將同盟會公開組建為國民黨，意在“使國中，只存二黨，以便政界競爭。”¹

其三，按英美兩黨政治常例，兩黨政治的主要內容就是組織政黨進行競選。為使新成立的國民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席位，孫中山以國民黨領袖身份，四處遊說，鼓動國民黨人積極參加國會選舉。即使在日本訪問，孫中山也把宣傳兩黨政治列為重要內容。正是在孫中山等人的鼓動下，國民黨順利地贏得了第一屆國會選舉的勝利。在參、眾兩院中，國民黨分獲 123、269 個席位，成為國會第一大黨。²

孫中山获悉國民黨國會選舉的勝利後，異常興奮。他在上海國民黨人舉行的茶話會止，儼然以執政黨的黨魁宣布政見：“本黨今既得占優勝地位，第一應研究者，即為政党内閣問題。……本黨將來擔任政治事業，實行本黨之黨綱，其他之在野黨，則處於監督地位。”³

孫中山天真地認為，一個以英美為模式的兩黨政治體制即將確立。然而實踐證明，孫中山心中的理想不過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當孫中山等人沉浸於國會競選勝利之時，一度曾經贊同共和的頑固勢力的代表人物袁世凱，已開始了扼殺資產階級黨人政治理想的活动。

袁世凱先是指使親信暗殺了一直奔波於國民黨競選第一線的宋教仁，給正在慶賀勝利的國民黨人，擊了無情的一棍；隨後，袁世凱故意違反兩黨政治常例，組織了進步黨內閣；⁴最後，袁世凱則動用武力，操縱國會選舉，使西方的議會政治模式，不得不淪為中國專制強權的依附。

面對袁世凱對資產階級黨人政治理想的踐踏，孫中山雖組織黨人進行了反袁的“二次革命”，但最終也只是“有心殺賊，無力回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袁世凱恃仗武力解散了資產階級辛辛苦苦組織起來的政党和被資產階級黨人奉之為神殿的國會。1914 年 1 月 10 日，國會的解散，標志着孫中山等人嘗試西方兩黨政治的失敗。

對孫中山等人在民初嘗試西方兩黨政治的活动該如何評價？目前學術界仍褒貶不一。我認為，從中國政黨政治演變的全過程來看，孫中山在民初對西方兩黨政治的嘗試還是有其十分重要意義的。它是國人探索現代民主政治的開始。嘗試雖然失敗了，但它

1 孫中山：《在煙台社會黨、同盟會歡迎會上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二卷，第 403 頁。

2 僅次於國民黨的共和黨在參、眾兩院中分獲 55、120 個席位。

3 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茶話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三卷，第 5 頁。

4 為阻止國民黨組閣，袁世凱唆使國會中僅次於國民黨的共和、民主和統一三黨合建成進步黨。進步黨組建後，在國會中的席位仍不及國民黨，但他卻不顧這一事實於 1913 年 7 月 13 日命熊希齡組織了進步黨內閣。

体现了孙中山向往民主政治的愿望，显示了孙中山对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精神，为日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至少提供了可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孙中山希望建立两党政治模式，这种愿望与君主专制政治相比，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民主政治进程的意向。但问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党来行使政治权力？孙中山心目中的党，是他的国民党。但国民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决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孙中山等人为人为扩张党势，不惜抛弃革命党原有的政纲，以“新旧合作”、“朝野合作”相号召，把大批官僚政客和改良派拉入党内。这种“鱼龙杂处”的现象，使得国民党内意见分歧，步骤凌乱，以致孙中山准备组织党人进行“二次革命”时，国民党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试想，以这样的党，怎能把中国引上民主政治之路呢？要实现政党政治，必须要有一个真正健全的政党，这是孙中山在民初尝试两党政治给后人揭示的教训之一。

第二，孙中山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希望仿效英美，在中国确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套用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来为资产阶级服务，是无可指责的。但问题是，政党体制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际上，由是与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相适应的。民初的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说，实行西方两党政治的条件是不成熟的：（1）社会条件不成熟，对封建主义的革命远没有完成；（2）政治条件不成熟，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或是后来的进步党，都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党。事实上，孙中山期待的两大政党体系也始终未能建立起来；（3）文化条件不成熟，民初的民众，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知识都缺乏了解，即使象孙中山、宋教仁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追求的也仅是西方政治制度的形式。正是这种状况，使得在英、美等国尚有一定成效的政党政治，一旦硬搬到中国来实行，便完全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政党竞选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不顾国情，一味的生搬硬套外国的政治模式，想在中国确立起民主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这是孙中山在民初尝试政党政治给后人揭示的又一教训。

值得欣喜的是，孙中山在总结民初尝试两党政治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政治模式，又开始了新的探索。

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设想

试图重建革命党，以革命党去“以党治国”，从而确立由革命党一党独占政权的政治体制，这是孙中山在民初尝试两党政治失败后，对中国政治体制探索的又一个设想。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日本。经过半年多的思索和总结，孙中山终于明白：一切失败的根源，就在于自己党本身。为此，他决心重新建党，并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东京创建了中华革命党。

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实际上是在新形势下对中国政治模式的一种新探索。这种新探索，首先表现在他对民初国民党及其两党政治模式的否定上。

孙中山在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曾一再强调国民党是一个“政党”。而此时，孙中

山則一再声称，中华革命党“系秘密结党，非政党性质。”¹ 尽管孙中山这种对政党的理解，仍是错误地以斗争方式的公开或秘密去决定党的性质，但他对新旧两党性质的区分，无疑表明了中华革命党的创建，是他对民初国民党的一种否定。

在民初，孙中山曾认为，凡政党，其作用都是一样，因而看不到政党间的区别和冲突。经过民初尝试两党政治的失败过程，孙中山终于认识到民初的“政党”，大多是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因此他决心重建革命党，并把争取民主政治，促进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自己重建的革命党肩上，要求“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² 从民初抽象地谈论政党的作用，到具体地要求革命党独负责任，这无疑表明了孙中山已放弃对两党政治模式的追求。

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新探索，更具体地表现在放弃国民党旗帜、放弃西方两党政治模式的同时，又提出了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新设想，这就是所谓的“以党治国”。具体地说，就是由他新建的中华革命党去实行“以党治国”，就是今后革命成功后，“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³ 不再搞西方式的议会选举，一切政权，全由革命党“负完全责任”。⁴ 从而确立中华革命党一党独占政权的政治模式。

孙中山这种“以党治国”的新设想，其实质就是由中华革命党“一党治国”。为了实现这种“一党治国”的设想，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又采取了种种相应的措施：

(1) 以党代政的规划。在孙中山“一党治国”的设想中，孙中山的意图就是要以整个党的机构来取代国家机构，实行以党代政。因此，他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就将党的组织机构规划成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按他“五权分立”的理论，他在党的本部之外，设立了立法、司法、监督、考试四院。并且规定“成立政府时，……则四院各成立独立之机关”，“与本部并立为五”，“成为五权并立”。⁵ 1915年他在复中华革命党人杨汉孙的信中将此意说得更清楚白：“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⁶

(2) “训政”思想的提出。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恢复了同盟会时期的“革命三程序”说，并将“约法之治”改为“训政时期”。这一改动，孙中山是有其用意的。这实际上是为革命党掌握政权制造理论根据。

(3) 总理特权的规定。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恢复了同盟会时期的总理制，并把总理抬到了近乎专制的地位。他不仅规定总理有组织党人和委任各级干部的权力，而且要求所有党员向他宣誓效忠、签字划押。孙中山对总理特权的规定，显然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威，以利实现“一党治国”的目的。

(4) 对党员的等级划分。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以入党时间的先后，

¹ 孙中山：《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3页。

²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7页。

³ 孙中山：《批伍曜南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04页。

⁴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7页。

⁵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00页。

⁶ 孙中山：《复杨汉孙函》，《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84页。

把革命党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种，并规定“首义党员悉隶为元勋公民，得一切参政、执政之优先权利；协助党员得隶为有功公民，能得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普通党员得隶为先进公民，享有选举权利。”而“非党员”，则“不得有公民资格”。¹孙中山这种对党员及非党员的等级划分，其目的，也与“以党治国”的设想有关。他一方面想通过这些规定，由此激发革命党人的奋斗精神，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突出“以党治国”的特色。

对孙中山“一党治国”的设想该如何评价？我的看法是：

孙中山关于“一党治国”的设想，是在否定民初两党政治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政党政治模式不懈的探索精神。在这一点上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上述“以党治国”的有关内容来看，却存在着严重弊端：（1）以党代政，以党章规定公民权利，混淆了党章与国法的区别，这既有背于民主政治的常例，也很大程度地助长了党员入党做官的思想。（2）“训政”思想的注入，客观上使革命党高高置于民众之上，将党与民众隔离开来。（3）把党魁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孙中山的本意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结果反而限制了党的发展，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事实上，孙中山这种“一党治国”的设想，不仅成为国民党后来实行独裁专制的借口，而且在当时也妨碍了党的团结和发展。1914—1919年中华革命党的发展情况，也已说明孙中山这种“一党治国”确是一种难以行通的设想。到1919年，虽经党人多方努力，中华革命党仍无法取得政权，老党员却仍在不断地分裂。

三、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论

从1919年到1925年孙中山去世，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孙中山关于中国政治模式得到张扬时期。

此一时期，孙中山于1919年、1924年先后两次对自己领导的革命党进行了改组，并效仿苏俄，并在苏俄的帮助下，开始了“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实践。与此同时，孙中山前后发表了一系列论著，较为详尽地阐发他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全民政治”。

“以党治国”和“全民政治”，看似矛盾的政治模式被此时的孙中山统一绘制成一副理想的政治蓝图。

1917年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深深地鼓舞了孙中山，他对列宁的党表示由衷的钦佩。他曾在国民党党务会议上感叹：“俄国革命六年，其成绩即如此伟大；吾国革命十二年，成绩无甚可述”，明确表示，“此后欲以党治国，应效法俄人”。²1924年，孙中山在谈到如何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时，直截了当指出：“盖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

¹ 孙中山：《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98页。

² 《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68页。

之革命，非以俄為師，斷無成就”。¹

从 1923 年开始，孙中山加大了学习苏俄革命的步伐。他聘请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为顾问。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重新改组了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他创办黄埔军校，并仿照苏俄红军模式，创建了第一支国民党军队；他按照以党治国理论，把广东大元帅府改组成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把党置于国上”的实践。

但苏俄式的“以党治国”的党国体制，并不是孙中山心中理想的政治模式。在孙中山看来，“以党治国”只是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中的过渡模式，中国民主政治的终极模式是“全民政治”。

从 1922 年到 1924 年，孙中山相继发表了《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中国国民党党纲》、《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以及三民主义的系统演讲，阐发了他的“全民政治”理论。其要点有：

（一）“以党治国”是向“全民政治”发展的过渡形式

1924 年 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由孙中山提交讨论的大会宣言和《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文献。孙中山在这些文献中重新提出来了建国程序三期说：“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孙中山在文中再此强调了国民党在军政时期和训政时期的职责，要“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于既取得政权树立政府之时，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²他还多次重申学习苏俄革命中“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意义。他说：“现尚有一事可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当俄革命时，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³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此时为国民党人撰写了《建国方略》，重点解释了为何要有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为何要“以党治国”？他说：“是故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育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后还之政也”。⁴

由此可见，在孙中山设定的建国程序中，不仅军政时期，要“以党建国”，而且训政时期，也要“以党治国”。但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都是向“宪政时期”的过渡政治模式。

¹ 《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第 145 页。

²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22 页。

³ 孙中山：《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103 页。

⁴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 211 页。

（二）“全民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其内容是要有权管理官吏和法律

在孙中山看来，宪政实施之时，即是还政于民之时。还政于民，即是人民真正行使权力，也就是“全民政治”的开始。

全民政治是孙中山民权主义的重要内容。1922 年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中即说到“全民政治”，即是：“人民有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¹1923 年 1 月，孙中山在起草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中解释民权主义时又说：“民权主义：谋直接民权之实现与完成男女平等之全民政治，人民有左列各权：（一）选举权；（二）创制权；（三）复决权；（四）罢免权”。²

1924 年 1 月，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系统演讲，在民权主义演讲中又进一步阐释了“全民政治”。他认为全民政治就是贯彻主权在民的原则，要以民为主，要让全体人民都做国家的主人，参与国家的管理，实行民治。要实行全民政治，就要赋予人民直接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其中，选举权和罢免权，“是管理官吏的，人民有了这两个权，对于政府之中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又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去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其创制权和复决权，是“管理法律”的。“人民有了这四个权，才算是充分的民权；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³

在孙中山看来，全民政治，其核心是主权在民，就是要赋予人民有直接管理官吏和法律的权力，直接管理国家政治的权力。

（三）“全民政治”的模式是“权能区分”

为了确保全民政治的实现，孙中山提出了“权能区分”的方案。孙中山指出：所谓政治，包含政和治两个方面。“政是众人之事，集合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政权就是民权。治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权；治权可以说政府权。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一个是治权。这两个力量，一个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政府自身的力量。”⁴

孙中山在民权主义的演讲中，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指出，“在民权发达的国家，多数政府都是弄到无能的”；而“民权不发达的国家，政府多是有能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两者的最佳结合呢？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民权（权）和政府权（能）区分开来。也就是要把政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与此同时，要把治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管理。”⁵ 孙中山在诠释权能区分方案中，不仅详细阐述了民权拥有的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

¹ 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之基础》，《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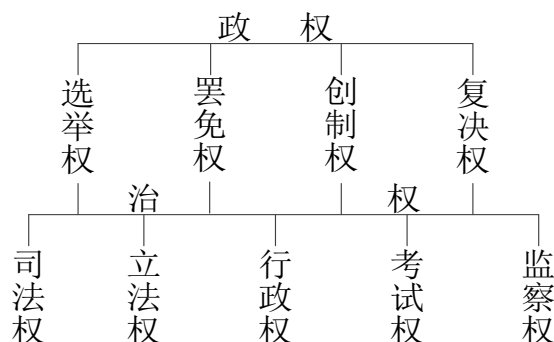
² 《中国国民党党纲》，《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 5 页。

³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50 页。

⁴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45 页。

⁵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47 页。

决权四种权力，还阐述了政府所拥有的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等五种权力。他说：“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为此，孙中山还构建了全民政治示意图，以诠释他心中理想的全民政治愿景。¹



孙中山认为，“中国能够实行这种政权和治权，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个新世界”。²

综上所述，孙中山在探索中国政治模式的过程中，向国人揭示了“两党政治”、“一党治国”、“全民政治”等不同的政治模式。这些模式有的曾付诸于实践，有的仅是他心中的理想。孙中山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每一个设想，都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近代民主政治体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探索者，他对中国政治体制所设想的每一个模式，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都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他身后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¹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52 页。

²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全集》第九卷，第 355 页。

